

第10卷

徐訏文集

上海三新书店

到乎... 徐訏

大桂...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一杯... 徐訏

喝呀... 徐訏

项...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徐訏

第 10 卷 · 散文 ·

徐訏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关于新旧之争的检讨	1
启蒙时期的所谓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21
在短期的思想自由环境中	30
革命文学的论战	39
左翼作家联盟及其性质	46
关于反左联的文学理论的几种说法	55
文艺大众化问题	61
服务于抗战的文艺	72
《三边文学》序	80
牢骚文学与宣传文学	85
《乐于艺》序	97
《美国短篇小说新辑》序	102
《一朵小白花》序	110
《斜阳古道》再版序	114
悼吉铮	117
吉铮的《拾乡》	123
《风萧萧》初版后记	128
《四十诗综》初版后记	134

《全集》后记	136
《传杯集》序	139
《怀璧集》序	143
从写实主义谈起	145
天才的容纳	154
难产的时代	161
待诱发的天才	165
水泥缝里的小草	169
政治的要求与文艺的要求	175
看中国电影	18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平剧改革	187
写在中国艺术歌曲之夜的前面	192
小学生的负担	195
民族间的了解	197
人物与神话	199
在台湾的青年人	202
台湾侨生的感想	205
缄 默	207
生 命	209
死	211
苏联的农村小说《躲避者》	213
不说话的自由	216
稿费问题	218
笔墨官司	221
人情味	224
死 亡	226
看大陆民间艺术的表演	228

种族与阶级·····	230
诺贝尔奖金·····	232
《阿尔发城》·····	234
巴甫洛夫的真貌·····	236
庙宇与广场·····	238
书 价·····	240
禽类学家·····	242
东欧的戏剧思想·····	244
天 才·····	246
歌与诗·····	248
宗教信仰·····	250
编辑之道·····	252
幸运儿·····	254
画展与艺术的提倡·····	256
青 春·····	258
苏加诺自传·····	260
陈腔滥调·····	262
“棒子”问题·····	264
时代感与时髦感·····	266
不安宁的世界·····	268
文学批评·····	271
文学教育·····	273
天才的沙漠·····	275
新的美国青年热·····	277
特务片的公式·····	279
自 杀·····	281
文章与年龄·····	283
敏感症·····	285

电影的艺术挣扎·····	287
生命·····	289
今年的诺贝尔文艺奖·····	291
博士与读书·····	293
“留学生”的安居乐业·····	295
同性爱·····	297
“我”的问题·····	299
和平的途径·····	301
方块文章·····	303
节日与贺卡·····	305
从“鸟叫”谈起·····	307
文学的堕落·····	309
苏联的艺术自由·····	311
蒋碧微的自传·····	313
知堂老人的回忆录·····	315
创造精神·····	317
艺文漫笔·····	319
患难与安乐·····	324
勇气与朝气·····	326
笑话与真话·····	328
台湾的火车·····	330
医学革命与社会革命·····	332
明星随片登台·····	334
台湾的裸浴照片·····	336
轻松幽默·····	337
祖国文字·····	338
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进步·····	340
港币贬值与数学教材·····	341

“挤牛奶”的悲剧·····	343
世界胸襟与美国眼光·····	345
传记里的人物·····	347
登月漫想·····	349
台湾的抄风·····	351
法西斯的旧调·····	352
发奋图强的台湾·····	354
中文与国语·····	356
盖棺论定·····	359
两性问题与文学·····	361
HIPPIES 的陶醉药与魏晋的五石散·····	377
作家的生活与“潜能”·····	394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的“能”与“生活”·····	420
从智能研究之成果谈天才的形成·····	444
谈巴甫洛夫的交替反射之研究·····	457
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	469

关于新旧之争的检讨

在晚清,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像是一只纸老虎一样,虽然已经很敝旧了,但还自以为是雄冠全球,可以鄙视夷邦的大国。第一次把它戳破的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以及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义和团事变,这只纸老虎就变成皮毛尽脱的小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文化失去自信,觉得应该向西洋学习。但先是只以为中国不如人家的是枪炮兵舰,派了年轻的留学生到外国,就是要他们学习这些东西。可是这些留学生到了外国,发现人家的文物制度,学术文化都有胜于中华者,这时候,觉得中国要改革的是各方面的改革,是根本的改革。可是有一部分人始终怀抱着中国精神文明之可贵,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就与新兴的年轻知识分子有一种代沟。

到了民国成立,中国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旧文化鄙夷已极,他们所要求是新,当时所说的新都是西洋来的。他们看到中国旧文化是一种负担,不扬弃旧文化,无法建立新文化。

代表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要求创新弃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初是《新青年》这一群人。

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同人，所反对的是什么，可以用他在《新青年》六卷一号所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来看，他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所有旧的文化都要否定，目的是要请“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到中国来。民主与科学，当时是这群新的知识分子所认为唯一的可以救中国的药方。这也就是说，自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把中国纸老虎戳穿以后，经过了辛亥革命，慢慢发现中国不如西洋的不光是“舰坚炮利”，不光是“物质文明”，而是属于精神的“民主”与“科学”。

但是这群青年人，对“民主”与“科学”有什么了解呢？陈独秀接下去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这些，才可以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他没有说。实际上这里面有太多内容值得我们思索与推敲，绝不能如此笼统而一言概括。但那时这是一种革命，革命的精神是不允许我们过细分析与取舍的。

当新文化思想从西欧各国随着武力和经济的力量涌进我们中国之时，我们马上发现我们精雅的文字无法表达这些内容。不但如此，我们也马上发现，为求文字的精雅所费的精力是一种奢侈的浪费。

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有一位裘廷梁，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作为《白话丛书》代序，有下面出色的话：

“使古之为君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另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

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将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顰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然而走耳……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文,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不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这里对于汉以后说理记事之书以为可存者百不一二,当然有些过分。不过他认为文章之美在于内容。文字只为表达内容美的工具一点,则正是要求文字解放的先声。至于谈到中国人聪明才力耗于咬文嚼字,而不为实学,是亦极有道理。

事实上,文学这东西,本是从民间而来,因为要表达所感所想,才有诗歌语言,要记录这些所感所想才有文学。以后这些文字,到了文人、学士手里,精益求精,以致形式越来越精雅完美,而内容则越来越空虚狭窄。而当时移变生活变化,文学要容纳新的生活内容(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新感觉)之时,这旧形式一定要破坏,而新形式就会产生。这种变化,大概不外三条路,第一,重新回到民间,寻求新的活泼的形式,第二是往外来的文化寻求新的、新款的形式,第三从古代的遗产中转化出新的形式。我们在以前文学史中可以寻到不少的例子。譬如当骈文的形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中所起的生活内容时,韩愈的复古的散文运动就创造新的形式。在佛教的思想输入以后,在译经与宣扬教义过程中,有译经的散文,与民间流行的传教的变文形式。在宋词走到极度精雅纤巧的形式时,元曲就从民间的语言中兴起了新的形式。了解西洋的文艺复兴的情形者,当也知道当时是一方面回归希腊的自由,与

民族民间语文的运用产生了灿烂的文艺形式。

在裘廷梁文章中,所谓“文字”之艰深,“困天下之人”之感慨。可以用晋维祇难与竺将炎译法句经(昙体经)的序文中几句话来证之: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共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善出,音近质直。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言,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丢厥义,是则为善。……”

当时正是骈文流行之时,为译经,只得用“不雅”的散文。因为骈文这个形式,实在无法容纳佛教的理义,所以到了唐朝,散文就成为文学的主流。

民国以来,中国在急于输入以及接受新思潮之时,要求摆脱艰难的文字之束缚原是必要的。裘廷梁的见解是再对也没有。但自己似乎没有在这方面发挥,从局促精致的桐城古文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则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文体,据他自己所说是:“……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国语法,纵笔行至,不检速,学者竞效,号‘新文体’……”。

梁启超先后主编过《清议报》、《新民丛刊》、《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新民丛刊》。他的这种文体当时有人称之为“时务文体”。我们现在且引他一段文章在这里: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惟故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

人常喜事。唯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涪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其然。”

这种文体，平易汪洋。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自由掺杂新名词新概念。严复曾经用精奥的古文翻译英国的名学社会科学等名著，为力求古雅，必须以过去文言文雅僻辞汇去译新的概念。于是这些新的概念变成意义混淆不清难辨，难解难认。这也正如想把佛经的意义硬化入于妍丽的骈文里一样。梁启超这种新文体所以正是文言文的一种解放。当时的确风靡不少读者。就以不赞成这类文体的严复，也说梁的文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这种从文言文解放出来的文体，使习惯于铿锵的文言文者易于接受。至于白话文，则原是存在于民间文学的形式，一直为文人学士所看不起的形式，而它的弹性也就很大，也就是说更能吸收表达新思想新概念。

而这个白话文的形式，则由胡适之想到，那时候他在美国，就与同时在美国一些朋友谈到讨论到，大家都反对，尤其是对于诗歌之白话化。但胡适则从讨论中觉悟一个问题，他发现：

“一部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他又说：

“……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如没有各国活语

言作新工具，近代欧洲人还须用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的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是我的新觉悟。”

胡适的这项觉悟，就产生他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新青年》这个刊物，原是命名《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一年，改名《新青年》，那年十一月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的《新青年》发表出来。一九一七年八月，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教书。《新青年》停了几期，到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移至在北京复刊，那时候胡适之也到了北京，《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刘复、沈尹默、钱玄同六人轮流编辑，这六人都是北京大学教授。

胡适之的文学思想在美国得不到赞同的朋友，在《新青年》上就马上获得陈独秀的拥护，也获得其他各人的赞同。一九一七年一月陈独秀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二月号就响应他一篇文章，那就是《文学革命论》。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八项主张，那是：

- 一曰，须言之有物。
- 二曰，不摹仿古人。
- 三曰，须讲求文法。
-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 六曰，不用典。
- 七曰，不讲对仗。
-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则揭橥了三大主义，他说：

“余敢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当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自然引起很多人的不同的反应,胡适之于当年四月里,有一封信给陈独秀,他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言,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热,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能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更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是陈独秀的回信却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因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主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为吾人所主张者为绝对的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钱玄同却说:

“……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如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

这里我们自然很容易发现胡适的态度比较合于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民主,而陈独秀与钱玄同就太缺乏科学与民主风度了。

《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才有白话文学作品出品,同年四月号以后(四卷四期),就全部刊用白话的文章。而在那四月号里胡适之发表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这篇文章里,把《文学改良刍议》里的八项主张,改为四大原则,这是: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那时候,胡适之、沈尹默等都已经有了白话诗在《新青年》上出现。一九一八年八月,胡适为他第一本诗集写了一篇自序,他有这样的话: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文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字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用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唯一的利器。”钱玄同也为胡适之《尝试集》写了一篇序,他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同年十月,胡适之又发表谈新诗的文章,他说:“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从文学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大解放……这一次的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也是先求言语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关于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标榜的是白话文,所谓言文一致。但是中国有各地的方言,言文一致的主张,势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这个问题,胡适之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有答案,那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个所谓国语,是有所根据的。

原来国语运动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以前,那是为藉文字之改革

以求教育之普及。直隶王昭的官话字母就在一九四〇年出版。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一九一六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八月,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明年重新颁定注音字母次序,国音字典出版。

这个国语运动是为普及教育。现在国语的文学运动则是以国语作为白话的标准。在普及教育阶段中,并没有人主张以国语的白话代替文言文。在文学运动阶段中,则要以国语的白话取代文言文的地位。而胡适对这点,有很有力的根据,他说:

“……从北方区域慢慢地推广出去,不但整个北方,中原之地说白话,而且扩充到整个长江。从镇江开始经西,一直到四川,整个都是国语区域。从南京往北,一直到东三省,整东北,都是京话的区域。从东北一直到西北都是白话区域,从南京到西安都是白话区域。……再上去到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这都是官话区。这些官话就是我们的基础,所谓国语文字,白话文学,就是拿这么大的地区做基础。……这个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区域,百分之七十五人口所说的话,是我们的语言基础……”

这里,胡适为什么要这样看重于这“语言基础”呢?因为他对于白话文学的理想,是言文一致的文学。文章的标准应该是“明白如话”。

因为胡适当时的构想,白话文学要“明白如话”,因此对于诗,就成了一个最有问题的难题,在一九一六年在美国与朋友们讨论中,最使人不能同意的是诗。他当时就说:

“……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

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

以后胡适就写了许多诗,其成绩都在《尝试集》中。在其将初试作寄呈其友人时,一个说:“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梅觐庄语)一个人说:“足下此次试验的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任叔永语)

但这并没有扫胡适的信心,而于覆任叔永信中,还坚强地说:“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在胡适整个的《尝试集》中的诗篇,是不是有可以称谓诗的,到现在似乎没有人再细究这个问题,但这仍是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白话诗尝试是不是失败的问题。

如果白话诗以后的发展是另外的路,完全不是胡适之所尝试的,那么初期所写的也正可以说是失败,而胡适的“白话”作诗的理想也是一个失败。

其实对于中国旧诗词的革命意旨,梁任公时代也早已酝酿,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甲、丁酉间,吾等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甚嗜之。”那些诗如:

纲常惨以喀私德(cost),法会盛于巴力门(parliament), (谭嗣同的《听金陵说法》)质多举只手,阳鸟为之死。(夏曾佑《赠任公》)

实际上只是使读者觉得是新式打油诗而已。

另外,在这方面努力而为人所熟知的当时还有黄公度(遵宪)。他曾经做过多年外交官,他的《人境庐诗草》所集的诗,有许多都是新名词以及马来名词,他是对诗有积极主张的人,他有一首谈到他的主张。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他所谓“我手写我口”,应是白话诗了,但是他只想在旧形式装